

二十年 特刊

我们一起来怀旧

整整十年前,我们也做过一次纪念专号,就用了这个题目。转眼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似乎“怀旧”二字依然是表达我们当下心情最贴切的字眼。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二十年,意味着太多的变化。大的不说,仅说与我们办报紧密相关的报业、出版业生态,乃至思想文化界的状况,发生的变化就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

二十年间,这份报纸发生的变化也不可谓不大。从最初的对开四版到现在的二十版,中间历经增版、调价、套红改彩印、宽报变窄报,“世界图书”、“科技视野”、“文史天地”、“时代文学”、“书评广场”、“我的大学”、“学术双周刊”……一个个专刊苦心经营数年后又被新的专刊所替代。

大家都知道,传媒业是一个人员流动性很大的行业,《中华读书报》算是人员较为稳定的一个地方了,但二十年过去,也基本上换了一拨人,创刊时打天下的“老人”基本上都已离开,在新的地方开创了人生新的辉煌。在此,要衷心感谢他们为这份报纸创办和发展作出的贡献!祝福他们今后事业再创新高,人生美满幸福!

在这期纪念专号中,我们特约请了前两任总编辑撰写回忆文章(本版),梁刚建带我们重温了读书报从创刊起传承至今的办报理念,庄建则特别讲述了读书报坚

守文化理想的不易。祝晓风、赵武平、翁昌寿等三位读书报“老人”的文章则把我们带回了永安路106号,带回了虎坊桥(3版),那里,有很多人的青春记忆。

庄建文章中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回顾读书报的过往,我们也不禁有此一叹。为此,我们查阅旧报,搜索记忆,勉力编成读书报二十年“大事记”。其中必有许多遗漏,但也算是一份粗线条的读书报小史了(10、11版)。

倡导阅读、分享好书是读书报的重要使命与职责,二十年间,我们把最多的版面给了一本本好书,记录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在读什么、写什么、关心什么。二十年的《中华读书报》,是一部阅读史,也是一部精神史,从侧面为这个时代留下了记录。鉴于此,我们策划了“二十年二十书”这一单元,从读书报创刊的一九四四年起,分为思想和社科、历史和传记、文学、童书、畅销书五类,每类每年选一本书,五类二十年共百本书(13~16版、12版)。翻阅这五份书单,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年间各种思潮的起落、文化热点的流变、当代文学的累累硕果、图书市场的风起云涌……

书卷多情似故人。当读者看到本期报纸的时候,或许会和我们一样泛起些许怀旧的情绪吧!

而《中华读书报》,依然在路上。

《中华读书报》的光明因子



梁刚建

《中华读书报》红娟编辑来电,代表报社给我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谈谈《中华读书报》创刊时的办报理念。其实哪有什么理念,无非是闲得发慌加上心血来潮想干点喜欢的事而已。不过仔细想想,一张报纸也好,一介报人也罢,确实有它的传承和基因。光明报系诞生不了“财新”这样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强势媒体,也无法为《精品购物指南》提供有力的支撑;但《博览群书》、《书摘》乃至《中华读书报》这样门类整齐、品格相近又各有侧重的媒体,基本上是倚着“光明”这棵大树而生存和成长的。《光明日报》的过往和基因,深深地烙在了我们这些新老报人的身上,挥之不去。

198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光明日报》。这是我心目中神圣无比又高深莫测的地方。安排工作时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想去“史学”、“哲学”或者“文学遗产”,被断然拒绝,说那里的编辑不是著作等身至少也是术有专攻。我退一步要求去“百家争鸣”,也被婉拒,意思是那虽是文摘编的栏目,但如何从林林总总的各家之论中选取最有价值的观点,不是大学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儿所能。于是我被打入总编室的夜班,一干就将近5年。不过这5年并没有白过,我研读每一篇好文章,体会前辈们的思想和文风。后来我尝试着拿起笔来,写一些鸡零狗碎的小文章,但都关乎思想或文化。后来我凭借几十篇发表过的杂文,挤进了《光明日报》评论部的大门。

说到《中华读书报》延续了怎样的传承和基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这是第一个基因。我们看《光明日报》从1949年6月创刊至今,虽然几次调整主办单位 and 办报方针,但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独特定位始终没有改变。《中华读书报》创刊时并不号称面向所有读者,而希望把它打造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其品牌版面“家园”即寓意于此。它的约稿采访、发行推广,都是瞄准这个清晰的群体,而绝不会尝试进入建筑工地或者珠宝店。甚至它的广告,亦是新书或者期刊目录。实践证明,所谓读者面越宽,越不容易俘获读者;

反倒是面向特定群体的,才有需求和生命力。当今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刊物是《美国退休人员》(AARP Magazine),居然达2000多万份。

重名人以壮声色,这是第二个基因。我们看光明的历史,简直就是一本名人的花名册。主持编者章伯钧、胡愈之、邵宗汉、常芝青、储安平……作者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钱伟长……哪个不是如雷贯耳。名人自有名人的身手,虽不能字字珠玑,但肯定能说出异于普通人的道理。《中华读书报》也尽量搜罗当下名人,王蒙、叶嘉莹、金克木、张中行、汪曾祺、刘心武、丛维熙、谢逸、邵燕祥、葛剑雄、周国平……王小波甚至开了专栏。至于采访过的人就更多了,饶宗颐、季羨林、张岱年、陈岱孙、李泽厚、林毅夫……记得红娟甚至采访过与海明威喝过咖啡的翻译家盛成老先生。正所谓“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样的场面,如此的阵容,难免不让人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读者从这些大家的文字和思想中汲取了太多的营养。

自诩高雅、不认流俗。这是它的第三个基因。我初来光明之时,险些被它的高雅惊到。所谈所见,全是文史哲经,见不到一点柴米油盐。我在评论部时的一位领导,说话从来只说天上的,根本不谈地上那点凡事;连形象都是硕大的眼镜配上闪亮的脑壳,我们曾戏称他为“光明形象代言人”。这样的风格,导致彼时的光明全是谦谦君子、抽象超脱;正如谭嗣同诗云“人生绝对聪明处,只在虚无缥缈间”。同事间彼此来往以清淡为基本方式,绝不彼此攻讦,更无职场政治。这样的因子传递到《中华读书报》,也形成了一片和谐纯净的氛围,俨然“世外桃源”。工作起来专心致志,累在其中乐也在其中;关键是没人提奖金加班费,提了也没有。

《中华读书报》并不是一张学术性的报纸,一般不刊登学术性太强或太过专深的文章。收到这样论点论据齐全正儿八经一论再论甚至带着英文提要连脚注都相当规范的大作,我们先要请编辑看下是否看得懂是否读得下来,如果连编辑乃至总编辑都不甚了了乃至不知所云,那只有客气地函告“敬请转投学术期刊”。报纸毕竟是面对广大

读者的,不比《甲骨文研究》只对少数专家服务。据说一张报纸,如果发一篇连编辑都看不懂的文章,会忘掉10个订户。当然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也可能是9个或11个。不登学术文章,并不代表这张报纸没有学术性,它的学术往往隐藏在浅显平实的观点和通俗易懂的文字中。要相信,越是大家,越能把艰深的学术观点设法传播给普罗大众;倒是那些真把刀,会把文章弄得屈辱龌龊。

《中华读书报》也不是一份思想的报纸,它不以布道或者启蒙为己任。但很显然,它是一份有思想的报纸。它的思想,不是横眉立目咄咄逼人,而是在文化的视角和温婉的叙述中娓娓道来。这一点,也得益于光明的基因。姚文元的大字报不会投给《光明日报》。我们知道那篇扭转乾坤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思想檄文,但它从题目到内容都是从哲学的一个概念入手,自然而然地破题。它比所谓高举什么、坚持什么、不能怎样的论述,思想性更强,易接受度更高,效果也更好。

当然,任何基因,哪怕最优秀,总有它的薄弱之处。比如书生气和保守性,导致它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中摸不太着头脑,说好听点是气定神闲,说白了就是无所适从。好像《中华读书报》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微信号,官方微博也好久没有更新了。这也太不拿新媒体当回事了。话又说回来,假若它在当今媒体环境下如猛虎下山、所向披靡,或者为博眼球连发猛文,乃至迎合市场转走八卦路线,我们也无法在这里谈传承和基因啥的了。

耐心耕耘,必有丰硕的收获。那些为这张报纸付出过辛劳的年轻人,因传承和基因所致,后来基本上都成为文化界栋梁。那年从《光明日报》记者跳槽来的祝晓风,现在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审;当年的实习记者余海波,已担任《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另一位实习记者张毓强,不到40岁破格成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还有翁昌寿,也是40岁担任人大传播系主任的重担……至于当主编、当总监的,更是数不胜数。这就好比光明系走出来的同事基本都取文化定位,没有产生什么土豪。那天几位老同事掰着指数了下,当了出版社社长的就有十三位之多。



庄建

心中千言,却难落笔成句,写一给《中华读书报》20岁生日的文字,竟如此纠结,要说的似乎很多,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直到坐在电脑前,心无旁骛,在《中华读书报》度过的那些日子,忽然有如昨天那般清晰。

2002年末,在《光明日报》已经工作了26年之后,我从报社图书出版部主任的岗位上调任《中华读书报》,接替前任总编辑梁刚建。此时,《中华读书报》已经过了8岁生日。

当时,中国内地有关图书出版与阅读的报纸及周刊已不少,较有影响的是《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书周刊》、《中国新闻出版报》与《中国图书商报》四家。进一步划分,前两者受众群更为接近,主体都是读书人。那时,《中国图书商报》的“书评周刊”也办得虎虎有生气,不失为读书报另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2003年是读书报繁忙的一年。持续了9年的全年51元的报价,难以以为继,必须动一动了。为对得起读者,也为自身更具竞争优势,改版也提到日程上。

但这一切远比当初设想的艰难。2003年12月的最后几日,在我,度日如年。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调价后的报纸订数,生死攸关啊!终于,赶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到来的消息让人振奋:报纸订数稳中有升。这真有如瑞雪之于农人,好兆头。

2004年的新年,因此好温暖。改版方案汇聚了全体读书报人的智慧,每个版面的设计都经过了几轮讨论,每个主持人都为此呕心沥血。编辑部到排版房距离咫尺,不少人都是溜小跑往来,编辑记者、校对检查、排版员……每一个人都忙碌着,像是装扮一个就要走上花轿的女儿。

2005年起,报纸改为彩印。第一期彩报付印的那天深夜,在读书报电脑房的排版机上,看着即将面世的一块块漂亮的版面,大家心潮难抑。第二天凌晨,彩色瘦身的《中华读书报》走下印刷机。捧在手上,感到基本满意。“家园”版的清雅风格扩展到整张报纸,经过《新京报》美编帮助调色的色彩雅致、沉稳,把这样一份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心情就两个字:踏实。

2005年末,读书报推出了年度好书榜,榜单由编辑部讨论产生。讨论会热烈得有些激越,以致作为主持人的我都有些紧张。如今,好书榜已经持续了9年,一些榜上有名的图书,出版社重印时会把我们的评语放上书封、书腰上,广而告之;一些图书推广活动也常把上《中华读书报》好书榜作为评价图书的重要依据。

《中华读书报》自费订阅的比例一直较高,且十分稳定,这是办报人心中的一块基石,“铁杆读者”们的认可,无疑是我们努力、坚持的动力之源。

沉入心底的往事

《中华读书报》办得有声有色,还因为有一个悉心呵护她的办报人群体,执着、坚忍、敬业,自觉地与自己所服务的对象,保持着血肉的联系。

在编辑部中,有一个人群,尤其让我钦佩,不能释怀。他们和其他的读书报人一样,为了心中的那一份眷恋,那一份追求,聚集在《中华读书报》,孜孜以求。他们是《中华读书报》中的“北漂一族”。应当说,在读书报,他们始终是最活跃、最坚忍的一族。

赵晋华是读书报的资深编辑。我去读书报前,就曾在一些有重量级学者参加的作品或学术研讨会上见到已在读书报做编辑的她。她坐在学者们中间,不像记者,更像是他们中的一员。更多的时间,她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倾听,她的功夫,体现在由她负责的版面上总能不断刊出学者们闪烁着学术与人生智慧的文章。记不清是哪位学者称赞过,在市场大潮席卷之下,赵晋华这个编辑做得可以用“纯粹”来表述。听到这话时,我正为读书报如何既坚持品位又更好适应市场而纠结、苦闷。

读书报的“腕”康慨,在南方的传媒业闯荡过,于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他的坚持与努力,他的风格与品位,熟悉读书报的人都会从他主持的版面中读出来。我在读书报的那几年,配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读书报曾连续几年出了英文版会议专刊。我们心气儿挺高,要办就想办得最好。于是,“淘汰”了京城其他做英文报的媒体,找到《中国日报》做合作方,英文审稿请了《中国日报》的资深编辑,排版也是该报的行家亲为,设计总负责,临近出报的日子,康慨都会在《中国日报》编辑部熬上通宵,虽然没给他冠什么头衔,但“事实总监”非他莫属。几次报纸刊印出来,反响不错,参与其中的人都挺兴奋。

张隽在读书报是老资格,一直是“一版专业户”。一版是报纸的“脸面”,要有好的头条,也要有丰富的资讯,作为周刊,第一落点的新闻往往可遇不可求,深度报道却是优势。但怎奈读书报十几位编辑记者都主持着版面,为新闻版提供稿件变得困难。主持一版的张隽常常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于是,张隽只得自己组织队伍,每周召集来实习的学生开选题会。尽管这样,因为一版的重要,常常是报纸付印当天,我这个总编辑还要挑三拣四地换稿,真是难为张隽了。

舒晋瑜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是那个爱笑的“女孩”,尽管如今她的女儿已经长得像她一样高,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她的勤奋、敬业是有目共睹的。“家园”如今在她的主持下出落得越发可人,她的作者给她那样多的肯定,我心里的一丝安慰是当初小琪鼎力推荐由小舒接替她编“家园”,正合我意。

外表看上去柔弱的咸江南,其实内心很有定力。说起话来,她从来都是细声细气,文绉绉的。她喜欢古体诗,自己也写,我听到过别人称赞她的诗写得不错。有时,你会觉得她仿佛生活

在一个玻璃罩中,不为世事烦扰,活得很恬静。这种心态,在她主持的文学评论版面上流溢出来,清秀隽永。但江南也有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尖锐,率直。我领教过。大概是2004年,读书报已随《光明日报》搬迁至今天的新址,一天,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咸江南找我谈话。当时,她可能被几位同事推为代表,反映意见。谈了什么,具体的细节已记不大清,但当时她说的一句话,我会记一辈子,因为,那句话让我无处遁逃。“报社经济也许不宽裕,那也不能剥削我们的劳动啊!”就是这句话。当时,包括“北漂一族”在内的读书报体制外的员工,除了个别的人,工资与在编员工相差较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均没有上社会保险。那时,我到读书报一年多了,工作千头万绪,工资待遇的事情又很复杂,本想从长计议,但就是江南这句话,让我深深自责,“剥削”这两个字,她用得准确,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让我警醒。我和小琪商量后,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丁杨是在“非典”那年的4月走进读书报的。这个扎着马尾辮的大男孩,之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过一档读书节目。很快,他就在读书报显示出固有的潜质,不仅融入了读书报的群体,而且,如鱼得水。细枝末节不去说了,总的感觉就是交给他的事,你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

韩晓东是在他寄来一叠自我介绍资料之后到读书报来的。先前,他在一家报纸也做过有关图书出版阅读的版面。资料中不多的作品剪报,却让你看到了他对图书出版、阅读的那一份钟情与独到见解。后来,他接替祝晓风主持“■望”。在晓风已经筑起的品牌高地上继续前行,想来晓东的压力不小,但他默默地承担,坚忍地继续,巩固了“■望”在读者心中的地位。2004年7月14日《■望》上登出的长篇报道《研究成果属于谁》的作者就是晓东。那是一次并不轻松的采访,稿件刊出后,被批评者扬言,要与《中华读书报》、与晓东法庭上见。孰不知,这种恐吓,早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一系列采访写作的依据,稳稳地可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只是让我们又一次见识了剽窃者的厚颜无耻,感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任重道远。

还记得2002年我刚到读书报的那个冬天,一个夜晚我和王小琪一起去看望不小心受了点儿伤的陈香。陈香住处在报社附近一处居民区中,我们摸索着,总算见到了那弱小的身影。那时的陈香,只有23岁,原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尽管初到读书报,但陈香很勤奋。读书报开业务会,编辑记者实习记者五六百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她特爱发言,常为报社建言献策。如今,她已是读书报的骨干编辑,在出版与读书的报道中开辟出一方天地。

在读书报,“北漂”占了半壁江山。毋庸赘言,“漂”的状态使他们面对更大的生存压力,但他们却坚忍地让自己的青春伴读书报一路走来,一天天,一年年,十年乃至更久,在读书报度过而立之年,成为人夫、人妇、人父、人母,这是怎样的执着,怎样的信念?我钦佩他们,也祝福他们。